

1949年中華民國海軍艦艇叛變原因

姚開陽

摘 要

海軍是高度專業技術的軍種，由各國海軍發展的經驗顯示，透過教育訓練將經驗和知識有效傳承以維繫傳統，對於海軍建軍發展非常重要。歷史上，海軍叛變事件相當罕見，故以個案研究探討崇尚傳統的海軍叛變原因，遂成為海軍歷史與管理研究上的重要議題。1949年中華民國海軍發生多起艦艇叛變事件，多數人將之與當時中央主事者與閩系之間的人事恩怨互相連結，形成以「派系矛盾」為主軸的解釋架構。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以及後來兩岸分治的情形下，相關內情無法考證，幸因近年來許多新史料出現，得以呈現事件當時的原始資料與現場經驗。本文透過蒐集兩岸不同觀點的史料，藉由文獻檢視與統計，探討在當時國共內戰背景下，「起義」或「叛逃」不同觀點的實情。發現影響當時海軍叛變的原因非常複雜，傳統上的軍官集團間派系鬥爭的解讀並非充分條件，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因素；透過本文的海軍艦艇叛變之個案分析，或可提供兩岸以更寬闊的視野來看待內戰歷史。

關鍵詞：海軍史、閩系、1949海軍叛變、國共內戰

Causes of the ROC Navy Mutinies in 1949

Kai-yang Yao *

Abstract

The Navy is a highly professional military branch.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Navy to emphasiz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o that experience and tacit knowledge can be successfully passed on and thus maintaining its tradition. This has been the case of the Navy in many countries.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causes behind cases of Navy mutiny, which were very rare, becomes especially interesting in the study of Navy history and managerial practices. In the whole year of 1949, during the final month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there were many case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naval ships defecting to the Communist side.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those defections were caused by factional conflict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Min (Fukien) Faction that dominated the Navy. However, this widely accepted "factional" explanation is not based on solid evidences or comprehensive inquiry.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number of government documents were release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biographies of the leaders of 1949 Navy mutiny were published. These new materials provide eye-witness accounts as well as first-hand data regarding the factors behind those mutinies. This article collects these new materials and examines the participants' statements for an analysis of the causes. The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dicate that reasons behind the 1949 Navy mutiny were very complex, rather than one single factor. While many of those statements do not deny the relevance of factional struggle, the latter was neither the only nor a sufficient explanation. By conducting case studies, this article shows the need for a broader and more open-minded perspectives in studying historical events during the Chinese civil war.

Keywords: History of Navy, Ming Faction, 1949 Navy Mutiny, Chinese Civil War

* Master of Institute of Oceanic Cultur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1949年中華民國海軍艦艇叛變原因*

姚開陽**

壹、前言

海軍是高度專業技術的軍種，由各國海軍發展的經驗顯示，透過教育訓練將經驗和知識有效傳承以維繫傳統，對於海軍建軍發展非常重要。歷史上，海軍叛變事件相當罕見，故以個案研究探討崇尚傳統的海軍叛變之原因，遂成為海軍歷史與管理研究上的重要議題。

中華民國海軍之主力艦艇在抗戰期間幾乎全軍覆沒，戰爭後期才在盟軍協助下派員赴英美受訓並接收援贈租借艦艇，加上戰後敵偽投降與賠償的軍艦，重建海上武力。¹ 但是國共內戰在1949年形勢發生轉變，2月12日黃安號海防艦成為海軍第一艘叛逃的軍艦，之後有2月25日重慶號巡洋艦、4月23日第二艦隊、9月19日長治號砲艦、11月30日江防艦隊陸續叛變，總計在1949年共有97艘艦艇、三千八百餘人投共，另有4次失敗。² 直到1950年後國共隔海而治，海軍艦艇的

* 感謝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對本文提供的寶貴意見，與本刊兩位匿名審稿委員的細心指導與修正意見。

收稿日期：2019年9月20日；通過刊登日期：2019年11月25日。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碩士

¹ 張力，〈1940年代英美海軍援華之再探〉，收入李金強、麥勁生、劉義章編，《中國近代海防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1999年），頁289-314。

²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起義投誠·海軍》（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頁735。

叛逃投共事件才停止。

分析當時海軍艦艇叛變的原因，長期以來是用「派系矛盾」的概念來解釋。此因戰前中國海軍高層皆係以馬尾海軍學校（以下稱馬尾海校）出身的「閩系」軍官為主體，戰後海軍重建，蔣介石任命陸軍出身的桂永清為副總司令並兼代總司令，桂因專業背景難以讓人信服，故重用青島系的馬紀壯（1912-1998，青島海軍學校第三期，以下稱青島3期）、劉廣凱（1914-1991，青島3期）、俞柏生（1913-2008，青島3期）、宋長志（1916-2002，青島4期）等少壯軍官以為制衡，造成1949年有不少閩系背景的艦長率艦叛變，以及閩系大老如薩鎮冰、陳紹寬、曾以鼎、林遵、李世甲、周應聰、曾國晟等人，也在1949年後選擇留在大陸為中共效力；因此，容易讓各界以為海軍的「派系矛盾」與1949年發生的大規模艦艇叛變事件具有因果關係。隨著近年來政府檔案和史料的開放，以及更多第一手資料與口述歷史的資料公開，有助於釐清1949年海軍艦艇叛變的情境與理解叛變原因。本文即以文獻研究和統計探究「派系矛盾」和海軍叛變的關聯性，以作為還原歷史真相的起點。

貳、派系矛盾的歷史根源與現象分析

中國官僚體系的分析，常以非正式組織的團體所形成的基礎為「關係」，如同鄉、僚屬、同學、師生和同僚等，交織成綿密的人際網絡與利益團體。³海軍依其教育養成學校來源發展成各自的次級團體，「閩系」主要以馬尾海校畢業生為主，此外，江南水師學堂及煙台海校、吳淞商船學校亦屬泛「閩系」，由於長期主導海軍部，因此又自稱「中央海軍」。「青島系」以葫蘆島、青島海校畢業生為主，又稱「東北海軍」。「粵系」以廣東黃埔海校畢業生為主，又稱「廣東海軍」。「電雷系」以軍政部電雷學校畢業生為主，抗戰期間與青島海校合併。

國民政府時代，閩系長期把持海軍部，當時海軍軍官超過70%，本部官佐在

³ 張潤書，《行政學》（臺北：三民書局，2009年修訂四版），頁264。

1937年甚至高達85%具有閩系背景，高階將官更幾乎全部都是閩北人，⁴當時海軍部內僅通行閩北方言與英語。同時，馬尾海校因為受英國教育影響有強烈的菁英色彩，甚至瞧不起其他海校背景的同儕，加上閩系從北洋水師覆滅之後就主導北京之海軍部，自稱「中央海軍」，排擠其他派系而造成彼此之間的矛盾。其中尤以東北海軍的沈鴻烈與閩系衝突最甚，東北易幟前甚至彼此發生過戰鬥。「個性秉直，不擅言詞」的閩系將領陳紹寬掌權期間更與中央格格不入，還經常頂撞蔣介石，蔣因暫時無人可用，只能隱忍遷就。⁵

在二戰後中國重建海軍的計畫與人事安排上，蔣介石已無須多加考慮傳統派系的影響力，故裁撤各海校並建立中央海軍官校，取消原海軍總部、罷黜陳紹寬；同時，由軍委會轄下的海軍處升格為新的「海軍總部」，並任命與海軍素無淵源的桂永清（黃埔軍校1期）為代理總司令，並重用「青島系」與「電雷系」青壯軍官，這讓重視海軍傳統和自命為中央海軍的閩系軍官產生失落感。⁶此外，抗戰勝利後政府高層的貪污腐化，加上國共內戰造成物價飆漲，民不聊生，更使得閩系對政府的不滿有增無減。

上述矛盾，首先因「伏波艦沉沒事件」而浮上檯面。「伏波艦」是二戰後英國援助的巡邏艦，在英國受訓接艦的艦長柳鶴圖中校（1915-？，馬尾4期）⁷與全艦閩籍官兵回國後皆遭桂永清撤換。該艦於1947年3月19日深夜自馬尾駛往臺灣，於澎湖外海的龜嶼被招商局由廈門駛往上海的「海閩輪」自艦尾追撞，全艦除輪機官焦德孝上尉（1915-？，電雷3期）一人獲救外，少校艦長姜瑜（電雷1期）以下官員14人、士兵94人、海軍官校見習學生18人及乘客4人全部罹難。⁸

海事法庭審理此案時，海軍上海基地司令方瑩少將（1889-1965，吳淞商船

⁴ 張力，〈航向中央—閩系海軍的發展與蛻變〉，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五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2000年），頁8-9。

⁵ 金智，《青天白日旗下民國海軍的波濤起伏》（臺北：獨立作家，2015年），頁259-261。

⁶ 張力，〈陳紹寬與民國海軍〉，收入《史學的傳承》編輯小組編，《史學的傳承：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頁18-23。

⁷ 柳鶴圖後擔任國防部新聞局長及軍事發言人，離開軍職後曾擔任外交部情報司及非洲司司長、駐獅子山國大使，1983年擔任駐荷蘭商務辦事處主任。

⁸ 張力等撰，《海軍艦隊發展史（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年），頁197。

學校，福州海軍世家，方伯謙後人）突然在媒體前痛批陸軍出身的桂永清是外行領導內行，任意撤換該艦閩籍艦長與官兵以致造成事故。⁹ 雖然方瑩隨即退伍，但桂永清卻因此對閩系官兵開始不分青紅皂白的整肅，激化了彼此的對立和互不信任。

桂永清在人事上重用青島、電雷，排斥閩系和馬尾海校畢業生的作法，也造成許多幹部的離心離德。無論是基於理念，個人恩怨，投機或被脅迫，這一年裏，總共有九十七艘各式艦艇，三千八百多名艦勤官兵投共。¹⁰

除了「派系矛盾」外，在實務上尚有二個鮮為人知的因素如下：

一、海軍除了軍官之間存在派系競爭關係外，在艦艇上的基層士官兵也有以省籍族群認同為基礎的派系。其中「閩籍」為馬尾海軍練營出身，「山東籍」則因早年北洋水師在威海衛，以及護法艦隊北歸被張宗昌掌握成為渤海艦隊，最後納入東北海軍，許多山東人加入充當基層水兵後逐步爬升至軍士長；這些人實際操控艦上的底層運作，猶如幫派頭目，有時甚至連艦長也不敢過問。

二、馬尾海校從創建開始即採英國海軍教育方式，許多人曾留學英國，較傾向英式民主，政治立場上認為海軍是國家的軍隊，反對內戰與黨派之爭。辛亥革命時薩鎮冰（1859-1952，福州船政學堂2期）率艦隊在武昌江面鎮壓，艦隊中的漢人軍官嚮往革命，要求薩鎮冰陣前起義，薩雖然嚮往民主政治，卻反對打內戰，為了避免內部武裝衝突，選擇離開艦隊到上海退隱。1949年薩鎮冰與陳紹寬拒絕蔣介石邀請赴臺，選擇留在福建也是基於同樣的理由。

近年因文獻資料的開放，新近出現1949年中華民國海軍艦艇叛變事件相關資

⁹ 根據英國海軍傳統，副長不能在原艦升艦長，而必須到下一級艦歷練艦長之後，才能升任本級艦艦長。因為英國海軍的副長，等於商船的大副而非副艦長，職責不同，而且因副長不可能取代艦長，才不會造成兩人的猜忌，但桂永清以陸軍的習慣認為，副團長可以升團長，副長為什麼不能在原艦直升艦長？硬要插手干預，就打亂了海軍的規矩，讓謹守英國海軍傳統的閩系，對桂永清非常不滿。

¹⁰ 王玉麒，《海癡：細說余振興與老海軍（1889-1962）》（臺北：河中文化，2011年），頁140。

料，如：中共方面的文獻、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當年稱保密局）檔案、國史館與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的政府檔案與電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口述歷史，以及出自海軍世家馬逸夫先生的手稿等私人文獻。藉由這些檔案文件和當事人經驗的陳述，特別是基層官兵所發動的艦艇叛變事件之內容，可以發現「閩系」軍官在各叛變事件中所占比例並不如想像中的高，且各艦的叛變原因不盡相同，難以用「派系矛盾」來概括解釋。

叁、1949年海軍艦艇叛變事件的分析

1949年海軍艦艇叛變投共事件，依時間軸列表如下（投共未成功者不計人數。另有海軍離船人員、海關巡緝艦艇與軍租商船的投共，因與本主題無關，故不計在內）：

表1、1949年海軍艦艇叛變投共事件一覽表

日 期	艦 名	艦 種	地 點	艦艇數	人數	狀況
1949/02/12	黃安	海防艦	山東青島	1	65	成功
1949/02/17	掃201	掃雷艇	山東青島	1	22	成功
1949/02/22	接29	佈雷艦	山東青島	1	—	失敗
1949/02/25	重慶	輕巡洋艦	上海吳淞	1	574	成功
1949/04/04	崑崙	運輸艦	上海吳淞	1	—	失敗
1949/04/23	海防第二艦隊	海防艦、淺水砲艦、登陸艦艇等	南京 笆斗山	30	1,271	成功
1949/04/23	第三機動艇隊等	巡邏艇等	江蘇鎮江	41	約400	成功
1949/05/01	永興	巡邏艦	江蘇太倉	1	—	失敗
1949/05/24	漢口巡防處	砲艇	湖南岳陽	5	50	成功
1949/09/19	長治	砲艦	長江口	1	167	成功

日 期	艦 名	艦 種	地 點	艦艇數	人數	狀況
1949/10/18	美頌	登陸艦	香港	1	—	失敗
1949/10/22	舞鳳、砲38、 巡40	淺水砲艦、 砲艇	廣東	3	46	成功
1949/10/26	聯榮、砲25	步兵登陸艦、 砲艇	澳門	2	70	成功
1949/11/09	光國	砲艇	廣東南澳	1	32	成功
1949/11/25	第二機動艇隊等	砲艇	廣西柳州	10	370	成功
1949/11/29	郝穴、永安	淺水砲艦	四川忠縣	2	160	成功
1949/11/30	江防艦隊	淺水砲艦	四川重慶	5	400	成功
1949/12/04	第二機動艇隊	砲艇	廣西南寧	3	36	成功
1949/12/07	同心	運輸艦	四川萬縣	1	80	成功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起義投誠·海軍》（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頁735。

一、青島三艘艦艇

1949年2月在青島發生的三次叛變事件，主事者都不是閩系軍官。12日叛變的「黃安艦」（日本戰後賠償海防艦），主謀者艦務官鞠慶珍中尉與同夥的低階軍士官都是東北海軍水兵出身的山東人，叛變主因是上級剋扣伙食的利益矛盾，與派系毫無關係。艦長劉廣超是東北海軍出身（即後任海軍總司令劉廣凱的哥哥），當「黃安艦」叛逃開往連雲港時並未在船上。此外，因年初國軍即將大批原存第二軍區補給站的槍械彈藥、通訊器材及銅元輪胎等物資裝上「黃安艦」，作為臨時倉庫以策安全，因此連同軍艦都成了中共的戰利品。¹¹

¹¹ 蘇小東編著，《中華民國海軍史事日記（1912.1-1949.9）》（北京：九洲圖書出版社，1999年），頁787；張力等撰，《海軍艦隊發展史（一）》，頁322-323。



圖1、「黃安艦」投共官兵

說明：第一艘投共的「黃安艦」於1949年2月12日抵連雲港，參與的官兵在艦艙合影。

資料來源：姚開陽，《1949大叛艦》（臺北：蒼壁出版社，2017年），頁72。

17日叛逃開往煙台的「掃201」，是日本戰後賠償的輔助掃雷艇，主謀的輪機兵李云修、帆纜兵王文禮、萬成岐也都是山東人，叛變原因是打罵管教不當與搶劫漁民分贓不均，叛逃時艇長蔣德正好不在船上。¹²

「接29」是日本戰後賠償的老式佈雷艦（「接29」是接收字號，還來不及命名）。叛變的主謀是代理艦長劉建勝上尉，也是東北海軍出身的山東人，叛變原因是被其妹劉俊英策反。「接29」在開出青島港時即被攔截，叛變失敗後劉建勝被押往上海槍決。

¹² 張力等撰，《海軍艦隊發展史（一）》，頁319-320。

二、「重慶號」巡洋艦

原為英國皇家海軍「功勳巡洋艦」的“HMS Aurora”號輕巡洋艦，戰後援贈中國，命名「重慶」，於2月25日自上海出走，駛往中共控制區的煙台港，3月4日轉往葫蘆島。¹³發動叛變的「重慶軍艦士兵解放委員會」完全是由中下士與士兵組成，來自各省的都有，其中許多是知識青年從軍並到英國受訓接艦。發動叛變的主要原因是反對內戰、對前途失望，以及個人經濟問題。¹⁴叛變行動開始後所有軍官都被拘禁在艦尾，艦長鄧兆祥（1903-1998，黃埔海校18期）事先並不知情，是在被脅迫的情況下同意將船開到共軍控制區，當到達之後所有被關押的軍官都只能宣稱起義。



圖2、發動「重慶艦」叛變之「士兵解放委員會」

說明：發動「重慶艦」叛變的「士兵解放委員會」在抵達葫蘆島時手持自己縫製的白底紅星旗在碼頭合影。

資料來源：姚開陽，《1949大叛艦》，頁97。

¹³ 張力等撰，《海軍艦隊發展史（一）》，頁181-182、198。

¹⁴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起義投誠·海軍》，頁75-105。

1949年6月「重慶艦」的輪機上士麥煥坤（英國華僑）從東北逃出，抵達香港後向《華僑日報》吐露了叛變的全部實情，保密局取得其內容，於6月29日以「皇集台0014號」文呈報局長毛人鳳，毛人鳳在7月13日以「甲抄269號文」呈報總裁蔣介石。在報告中麥煥坤透露了幾個重要的訊息：

並不是官兵們思想轉變，也不是傾向於共產主義，其實說來傷心，這只是派系之爭與不滿待遇，由局部的士兵出賣了重慶艦。……雖然重慶艦的叛變並不單純為了派系之爭而引起，但至少這一點內部的小摩擦就潛伏了叛變的危機，而叛變的最大原因還是重慶艦返國後待遇一落千丈，引起士兵不滿所引發。¹⁵

麥煥坤提到的待遇問題主要是航海津貼遲遲未能發放，與從英國帶回來的外幣被強迫兌換成金圓券，大幅貶值，變成廢紙，個人經濟損失很大，雖然開始有提派系問題，但他又說那並非重點（注意麥煥坤並未指明派系是閩系）。麥煥坤還說明為什麼二十幾個士兵能劫持那麼大的一艘軍艦：

發動這次叛變的二十餘人盡是中士階級以下的士兵，沒有半個是尉級以上的長官，……主要原因是艦長事前既不知道，也沒有準備，「出其不意」，舉發於倉促之間，……當其他官兵發覺事情有點不對時，已經在武力威脅之下，而且已經被繳去槍械。¹⁶

麥煥坤提到鄧兆祥艦長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投共，而且他還提到艦上其他官兵曾暗中發動反抗，但因被隔離監禁且沒有武器，所以未能成功：

艦長知道他們要叛變政府投往中共，艦長仍異常鎮定，對叛兵曉以大義，但叛兵不僅不聽，並且說假如艦長不允發令開航即爆炸軍械庫，使全艦同歸於盡，際此危急關頭，鄧艦長發覺艦上電話電訊全斷，與各方失去聯

¹⁵ 「海軍艦艇叛變案」（1949年4月23日-1950年5月27日），〈海軍艦艇叛變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05050000C/0038/1571.3/3815。

¹⁶ 「海軍艦艇叛變案」（1949年4月23日-1950年5月27日），〈海軍艦艇叛變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38/1571.3/3815。

絡，知叛兵已控制全艦，卒在叛兵監視再四催迫之下而發令開航。¹⁷



圖3、「重慶艦」艦長鄧兆祥抵煙台

說明：根據麥煥坤敘述，鄧兆祥在2月25日晨遭叛變士兵威脅投共時還曉以大義，一天之後抵達煙台時卻是這樣的肢體語言與表情，頗耐人尋味。

圖片來源：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起義投誠·海軍》，無頁碼。

為了防止國軍空軍的轟炸，「重慶艦」由煙台轉往葫蘆島，在途中兩名士兵曾道明、楊繼祥跳海自殺。由於國軍空襲的威脅仍在，「重慶艦」一到葫蘆島，立刻以樹枝漁網做偽裝，共軍並派來兩個高射砲連，配合艦上的高射武器共同防空。3月18日，國軍空軍派出多批B-24重轟炸機連番轟炸，造成艦上十多人受傷，這時出現荒唐的一幕：

士兵完全喪失了戰意，紛紛丟棄了崗位離艦，登岸爭先恐後，唯恐逃之不速，艦上還在指揮迎擊國機的共軍睹狀也急起應付他們，不再發砲打飛機，而立即架起了機槍轉向逃命的士兵掃射，於是艦上陷入了大混亂狀態。¹⁸

¹⁷ 「海軍艦艇叛變案」（1949年4月23日-1950年5月27日），〈海軍艦艇叛變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38/1571.3/3815。

¹⁸ 「海軍艦艇叛變案」（1949年4月23日-1950年5月27日），〈海軍艦艇叛變案〉，《國防

共軍起初還希望這批「起義」的官兵能駕駛「重慶艦」幫他們出戰，經過這次事件後決定將有用設備、物資、文件搬上岸，在3月20日放水自沉，以待將來，麥煥坤就是負責開通海閘的人。

在輪機部門下有一個「防沉管制」部門，這個部門是專責管理艦的緊急修理及安全水管，尤其是在戰鬥時期，這個部門特別重要，我是這個部門主管者，因此這次要放水沉艦，使我成為重慶艦的劊子手。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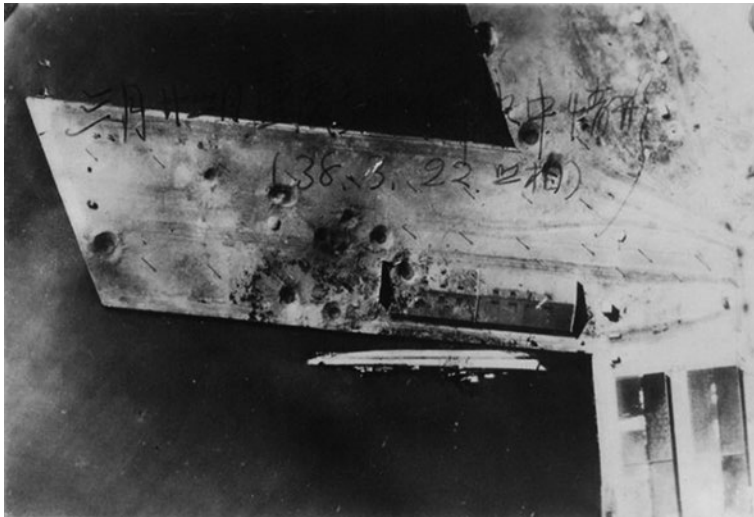


圖4、「重慶艦」炸沉之空照圖

說明：「重慶艦」自沉翻覆於葫蘆島港內，碼頭上的坑洞是國軍B-24轟炸機投彈的彈坑。這些照片是由空軍偵察機拍攝呈報給蔣介石。

圖片來源：「重慶黃安兩艦叛逃案」（1948年12月1日-1949年3月31日），〈重慶黃安兩艦叛逃案〉，《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7/622.1/2010。

綜上，「重慶艦」的叛變是由極少數（占總人數約三十分之一）因不滿時局的下層士兵所發動的叛變事件，艦長及絕大部分官兵不知情、不支持，但在武裝

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38/1571.3/3815。

¹⁹ 「海軍艦艇叛變案」（1949年4月23日-1950年5月27日），〈海軍艦艇叛變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38/1571.3/3815。

脅迫下，不得不一起投共，與派系因素關係不大。

三、「崑崙號」運輸艦

4月4日發生的「崑崙號」運輸艦叛變事件，是由艦長沈彝懋中校（1895-1950，煙台海校6期）發動。沈彝懋的資歷非常深，當年52歲，仍只是個海軍中校，所以滿腹牢騷。沈彝懋的兒子沈勛（沈友炳）是中共地下黨員，策動其父在由上海載運海軍機械學校學生與設備到馬尾的航程中起事，開往共區。當時「崑崙艦」上三分之二軍官與90%士兵都是閩系，由艦長帶頭發動成功的機率很高，將可能成為閩系叛艦的首例。

但「崑崙號」叛變最終僅成為一場鬧劇與悲劇，由於艦上許多軍官帶了私貨，有的還帶了家眷，譬如沈彝懋自己的妻子與兒子、媳婦都在船上，無法斷然投奔共區，於是商議下次再舉，船一到馬尾，同意參與者紛紛離艦躲避，只有沈彝懋毫無警覺回到自宅，最後與沈勛一同被捕，押往高雄左營槍決，他另一個就讀海軍官校的兒子沈白後來也被槍決。²⁰

雖然「崑崙號」船上絕大部分都是閩系軍官，但派系卻不是叛變的主因，而且閩系軍官在過程中優柔寡斷、猶豫不決，甚至為了一點私利壞了大事。根據保密局4月19日從福州發來的「勇皓義閩字第555號」調查電報，對「崑崙艦」上攜帶家屬與走私貨物的情形有很直接的描述：

艦長沈彝懋妻子常住艦中營運麵粉走私，此次來馬，其妻帶有麵粉三十包，其子沈友炳曾在上海與一東北疏散來滬之一女性訂婚，該女係共黨重要份子，訂婚後即誘惑沈友炳勸其父投共，彝懋尚未答應，其妻鄧氏（林森縣竹嶼鄉人）亦亟勸乃夫率艦投共。²¹

保密局4月22日繼續從福州以「勇養義閩字第56X號」電報對沈彝懋複雜的

²⁰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起義投誠·海軍》，頁106-109。

²¹ 「海軍艦艇叛變案」（1949年4月23日-1950年5月27日），〈海軍艦艇叛變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38/1571.3/3815。

家庭狀況做了更詳細的描述：

娶元配妻鄧淑英（年四十五歲，林森竹嶼人，即力勸沈彝懋投共者）又娶一妾名妹哥，住三鹿尾三營巷蕭宅。妻妾不合，故髮妻及長子常住崑崙艦中。其妻鄧淑英及子沈友炳以走私為營業，獲利甚厚，友炳性好冶遊，在上海娛樂場中結交多共匪份子。²²

可見當時老派閩系軍官的軍紀敗壞，把軍艦當成家族的商號在經營。而沈彝懋完全不知大難臨頭，還想回到艦上，被副長拒絕登艦並將他的行李拿下船，海軍總部下令馬尾巡防處將他逮捕。

「崑崙艦叛變」嚴格來說並沒有實現，只是開個會決定下次再行動，甚至沈彝懋所謂的叛變都是被動的，這大概讓他覺得情節並不嚴重而沒想到要逃跑，最後一家三口命喪刑場。²³

四、海防第二艦隊

1949年4月21日共軍發起渡江戰役前夕，國軍下令海防第一艦隊與江防艦隊的部分艦艇增援，讓此時的海防第二艦隊規模接近40艘，司令為林遵少將（1905-1979，煙台海校18期）。²⁴

4月21日江陰要塞叛變發生，在南京江面的海防第二艦隊被圍困，桂永清已飛往上海，並命林遵率艦隊突圍前往上海；然而當時的局勢對該艦隊非常不利，在南京附近已發生共軍砲擊英國軍艦造成嚴重死傷的「紫石英號事件」（Amethyst Incident）。²⁵當時人在「永嘉艦」的林遵，面對服從命令冒死突圍

²² 「海軍艦艇叛變案」（1949年4月23日-1950年5月27日），〈海軍艦艇叛變案〉，《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號：A305050000C/0038/1571.3/3815。

²³ 2000年左右，一名自稱是沈彝懋家族代表的鄭姓男子專程來臺灣拜訪筆者，希望向國軍陳情尋找先人遺骨，本人以「中國軍艦博物館」名義發文給海軍總部，海總由軍務署長譚明少將回文稱「年代久遠、查無資料」。

²⁴ 張力等撰，《海軍艦隊發展史（一）》，頁342-345。

²⁵ 1949年4月20日，英國巡防艦「紫石英號」（HMS Amethyst）不顧即將渡江進攻南京共軍的禁令，強行駛入被砲擊，英艦亦還擊。砲戰中「紫石英號」重傷、擱淺鎮江江面，

或順應大勢率部投降的兩難困境，內心慌亂如麻。

艦長（陳慶堃）告訴我，開會時，艦長們各有意見，司令則是六神無主，拿不定主意，只是邊哭邊說「怎麼辦？怎麼辦？」有些艦長也哭，不知如何是好。良久，才有位艦長提議以投票決定。²⁶

會議投票的結果是決定投共，但由於林遵在離開「永嘉艦」時忘記降下司令旗，讓「永嘉艦」艦長陳慶堃少校（1919-1983，黃埔海校22期）得以利用機會率領不明就裡的7艘艦艇往下游衝過江陰砲台的封鎖線抵達上海，陳慶堃還因此獲得蔣介石親頒青天白日勳章。²⁷

從這次事件中可以看出，選擇投共與否不純粹是派系因素，更可能是因為家屬所在的位置而決定的，譬如「營口艦」艦長邱仲明（1916-1991，馬尾6期）雖然是閩系，但因家眷在上海，所以選擇衝出；而「聯光艦」艦長郭秉衡（1919-？，電雷3期）雖然是青島/電雷系，但因家眷在南京，而選擇投共。

海防第二艦隊叛變後桂永清仍試圖挽回，於26日發給蔣介石的電報中還掩飾太平：

呈海軍江防幸賴鈞座威福，除惠安、永績、安東、江犀、美亨、美盛、繁光（應為聯光）、太原等八艦尚待本晚衝出江陰外，其餘信陽、永定、永嘉、永修、逸仙、營口、聯華、聯勝、吉安、武陵、楚觀、美樂、聯榮等十三艦皆陸續分抵，冒險衝至上海集中，雖有傷亡，但士氣旺盛，鬥志甚堅，惟興安、威海兩艦於衝出時不幸在江陰上游擱淺，現

艦上死亡19人（包括艦長）、傷27人。接著英國皇家海軍遠東艦隊旗艦「倫敦號」重巡洋艦（HMS London）率領「伴侶號」驅逐艦（HMS Consort）與「黑天鵝號」巡防艦（HMS Black Swan）前來救援又發生砲戰，救援未能成功，反而造成各艦更大的傷亡。最後「紫石英」號利用談判過程，在7月30日夜趁颱風江水上漲逃逸出海。在「紫石英號事件」（Amethyst Incident）中，英國海軍共死亡45人、失蹤1人、傷93人，是二戰之後英國海軍最大的傷亡。見陳謙平，〈論“紫石英”號事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頁57-66。

²⁶ 張力、吳守成、曾金蘭訪問，張力、曾金蘭記錄，〈王業鈞先生訪問紀錄〉，《海軍人物訪問紀錄》，第1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頁238-239。

²⁷ 蘇小東編著，《中華民國海軍史事日記（1912.1-1949.9）》，頁789。

已飭繼續下駛各艦相機處理中。²⁸

對於叛變艦艇，空軍一度建議應該立即炸毀，以防為共軍所用，但由於受桂永清26日電報的影響，空軍遲至28日才開始轟炸，許多叛變艦艇都已移往上游偽裝隱藏，導致轟炸效果不佳。同時在這次事件中，「逸仙艦」（艦長宋長志）與「信陽艦」（艦長白樹綿）曾掛白旗詐降而引起很多懷疑與爭議，然兩艦最終突圍而出，因宋長志與白樹綿皆為「青島系」，故亦與閩系無關。²⁹。



圖5、共軍代表視察投共之「永綏艦」

說明：「永綏號」砲艦隨海防第二艦隊投共，4月27日「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八兵團」司令員陳士渠由林遵陪同登艦視察，「永綏艦」在梯口擺儀隊與吹號迎送。

圖片來源：姚開陽，《1949大叛艦》，頁127。

²⁸ 「桂永清電蔣中正現已飭繼續下駛各艦相機處理中並與周至柔湯恩伯等商討新部署」（1949年4月26日），〈武裝叛國（一七六）〉，《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300-00199-071。

²⁹ 宋長志的事直到蔣經國就任總統後，黎玉璽仍寫密函向蔣經國告發宋通敵，見「黎玉璽呈蔣經國請查究逸仙艦江陰突圍經過秘辛等資料與調閱長江作戰卷相關檔案及約詢事件關係人」，〈蔣經國與各界往來函札（三）〉，《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2-00016-029。

五、「永興號」巡邏艦

5月1日發生「永興號」巡邏艦在江蘇太倉白茆沙之叛變事件，這時南京已經被共軍占領，海防第二艦隊投共，上海岌岌可危，「永興艦」由上海出發往長江上游巡邏，防範共軍順江而下，就在此時艦上發生叛變事件。主謀的少尉航海官陳萬邦（1927-1949，馬尾12期）與軍需官朱季剛持械進入駕駛台，要求艦長陸維源（1911-1949，青島3期）投共，陸維源用防水門之鐵棒反抗，擊傷朱季剛後竟被陳萬邦開槍擊斃，當時艦橋的麥克風是開的，所以全艦都聽到艦長被殺的慘叫聲，引起了其他水手的公憤，調轉尾部3門 40mm 機關砲轟擊艦橋，朱季剛當場被擊斃，陳萬邦跳水逃逸後亦被艦上水兵用衝鋒槍掃射而死。

此外，兩名參與叛變的電信兵徐英祥與方溫祥發現不敵，持手槍躲入電信室將門反鎖，副長彭廣荋指揮將船駛回上海黃浦江海軍碼頭，召來上海警察局的「飛行堡壘」警備隊用電鑽在艙壁上鑽孔輸入瓦斯，最後徐、方二員在電信室內自殺。³⁰ 陳萬邦是湖北恩施人，抗戰期間在貴州桐梓的馬尾海校入學，後併入中央海校為37年班，嚴格來說不能算是「閩系」，只不過36與37兩個年班全體被桂永清整肅，就都被歸類為閩系了。

「永興艦」叛變事件可說是有勇無謀，布置不周，顧此失彼，最後失敗並不意外。「永興艦」後來改名「維源艦」，以紀念被殺的陸維源艦長。

³⁰ 馬逸夫，《國府海軍艦艇在大陸時叛變補充資料》（手稿，2000年），頁20-22。上海特警灌瓦斯的部分在中共軍方的文獻與馬逸夫先生的手稿中都有提到，馬逸夫手稿連兩名信號兵的名字都有，但國軍對此卻隻字未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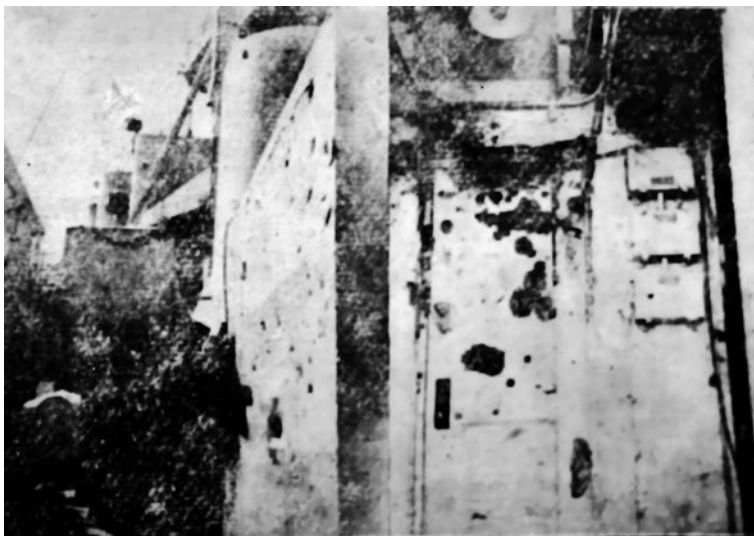


圖6、「永興艦」叛變受創圖

說明：「永興艦」反對叛變的官兵由艦中通道潛往艦尾，砍斷限制射向的框架將火炮調轉方向，將艦橋打得千瘡百孔，連主桅都幾乎被打斷了。

資料來源：姚開陽，《1949大叛艦》，頁158。

「永興艦」叛變事件發生後，調查人員在陳萬邦的抽屜裡找到36與37年班在「中訓艦」的開會紀錄，桂永清遂以此為證據，將兩個年班的學生全部逮捕。桂永清在5月13日給參謀長宋鐸的手諭中寫道：

辰文電敬悉，查航十一、十二畢業有共黨組已有確實證據，除羅錡等廿三員外，太湖、太昭該兩期學生亦應嚴加看管，交情報、監察兩處嚴訊為要，太湖、太昭擬具調整次可以即辦。³¹

桂永清同時手諭「太昭艦」艦長林鴻炳（1914-？，馬尾6期），「著該艦長即將馬尾海校軍官暨閩籍官兵一律調離，以策安全」。³² 但桂永清根本不知道林

³¹ 「航十一、十二期有共黨組織」（1945年1月1日），〈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手令彙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B5018230601/0037/100.3/3815/2/037。

³² 張力、吳守成、曾金蘭訪問，張力、曾金蘭記錄，〈林鴻炳先生訪問紀錄〉，《海軍人物訪問紀錄》，第1輯，頁120。

鴻炳其實也是馬尾海校畢業的。

「永興艦」叛變事件由於艦長的慘叫聲透過廣播系統傳遍艦上，引起艦上士兵的公憤，造成叛變失敗，並讓多名起事者喪命。中共地下黨內部檢討此次教訓，決定日後對於不同意參與叛變者即當場格殺，這就是後來「長治艦」殺戮甚慘的原因。³³

六、「長治號」護衛艦

上海被共軍占領後，國軍派遣軍艦封鎖大陸沿海各港口，執行限制外國商船進出的「關閉政策」。³⁴ 9月19日海防第一艦隊旗艦「長治號」由定海開往吳淞口執行該項任務，凌晨艦上發生喋血叛變事件，艦長胡敬端上校（1911-1949，電雷1期）、副長孔祥棟少校、航海官孫幼仁上尉、通訊官楊書芬上尉、槍砲官王英璋中尉等5名軍官與槍砲上士楊振武、一等兵陳克法、韓斗辰、于化文、艦長室衛士張宏川等5名士官兵被殺。

發動叛變的43個人中，包括領頭的帆纜中士陳仁珊等全部都是士官兵，而且其中除了一個臺灣人外，其餘都是閩籍，反而艦上的閩籍軍官此時已經全部被換成青島與電雷系的軍官。「長治艦」艦長胡敬端上校是1937年率領「史102號」魚雷艇在上海突擊日本「出雲艦」的英雄，當時剛從江防艦隊參謀長任上調來接替劉廣凱出任艦長不久，士兵對他並無成見，叛變當時一名年僅16歲的小勤務兵陳世忠持槍進入艦長室，脅迫胡敬端起床指揮軍艦投共，胡欲奪槍，被陳射殺。³⁵

³³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起義投誠·海軍》，頁138。

³⁴ 由於蔣介石堅持自己是正統，拒絕定義國共之間為內戰，讓共軍取得對等地位，因此不用「封鎖」（blockade）而創造「關閉」（close）一詞。

³⁵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起義投誠·海軍》，頁153-160。



圖7、「長治艦」叛變後靠泊上海碼頭

說明：「長治艦」叛變後駛往上海，在第二天清晨靠泊黃浦江海軍碼頭，上海葬儀社送來兩口棺木，將艦長胡敬端與副長孔祥棟入殮，政府方面稱叛變者將屍體拋入海中，是沒有依據的。

圖片來源：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起義投誠·海軍》，無頁碼。

問題出在副長孔祥棟。由於副長是艦上的執行官，大小事務都歸他管，這是英國海軍傳統，在中國海軍也施行此制多年都相安無事，但當時局動亂加上有人鼓動，就可能激化成為叛變事件。根據馬逸夫先生的資料，叛變當時孔祥棟為艦橋的值更官，當被叛徒脅迫時，他竟用25mm機關砲射擊艦艙4.7吋主砲的彈藥箱，欲與軍艦同歸於盡，因而被叛變士兵槍殺。³⁶

³⁶ 馬逸夫，《國府海軍艦艇在大陸時叛變補充資料》，頁18-20。共軍文獻只提到在駕駛台槍殺孔祥棟及戰鬥中艦艙彈藥著火，但未說明原因，馬逸夫手稿則指出是孔祥棟射擊所造成，並因此被殺。馬逸夫手稿透露，孔祥棟因為出身偽政府海校，必須改名才能在戰後的中國海軍服役，在當時很多人都是。不過馬逸夫手稿推測孔祥棟是保密局派來的，

七、「美頌號」中型登陸艦

10月18日「美頌號」中型登陸艦在香港海域的叛變事件，係由艦長毛卻非少校發動。毛是四川簡陽縣人，畢業於電雷學校第三期，由於「電雷系」一向自認為是「天子門生」，毛卻非的叛變讓所有人都吃了一驚。當時「美頌艦」上有山東與福州兩派人馬，毛卻非沒有利用較贊同起義的福州派，卻找上與福州派有矛盾的山東派，最後反被山東派出賣，連帶三十餘名表態的福州派官兵也跟著遭殃。

根據中共軍方資料顯示，「美頌艦」叛變失敗的主因是毛卻非在決定發動叛變的前夕，將心力投注於欲在香港記者會宣布起義的稿子與當天所掛旗幟，並未注意基層動向與事先控制艦上小型兵器櫃的鎖匙，最後被輪機中士申功慶（山東人）制伏，艦長毛卻非與槍砲官張紀君（河北人）被押回高雄左營桃子園刑場槍決。³⁷

但根據同案被判刑5年的毛卻非弟弟毛扶正在多年後的訪談錄中，卻說毛卻非只不過從香港拿了一支五星旗上船：

其實，楊滄活也不是共產黨，好像有個「民主同盟」吧。大哥下船和楊滄活聯絡了以後，認為想走的人就走，不走的就把旗子掛上去，把船放在那裡就好了，就是這麼單純的想法。船要交給誰？哪個人接收？跟哪個人聯絡？楊滄活又沒有在共產黨裡，我大哥是反叛嗎？³⁸

毛扶正所言可能是為其兄諱，但畢竟是現場當事人，仍有作為對照的價值。

八、其他

10月22日，海軍第四軍區第四砲艇隊的「舞鳳號」淺水砲艦與「砲38」、

則因無其他佐證故不列入。

³⁷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起義投誠·海軍》，頁163-164。

³⁸ 毛扶正等作，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編輯，《看到陽光的時候：臺灣白色恐怖受難文集》，第2輯（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4年），頁9-49。

「巡40」兩艘砲艇在廣東珠江叛變，開往廣州投共。「舞鳳號」上從艦長李杲上尉、副長梁庭魁中尉，下到水兵全部都是兩廣人士，地域色彩鮮明，與閩系並無關係。李杲與梁庭魁都在1950年5月25日參加了萬山海戰，李杲擔任共軍「桂山號」步兵登陸艦的領水員，船毀後被「永定號」軍艦俘虜送回臺灣，6月23日遭到槍決。

10月26日，「聯榮號」步兵登陸艦在澳門海面叛變，主謀的李振華與曲振華是山東籍，參與的8人都是士兵，艦長張孟駁雖然是馬尾海校9期，卻成為被叛艦者繳械關押的對象。³⁹

11月9日，在廣東南澳發生「光國號」砲艇叛變事件，主謀的電訊上士黃維鴻是江西人，其他還有閩籍、粵籍與臺籍等士官兵，他們殺死山東籍的艇長袁福厚上尉後，把砲艇開往汕頭投共。「光國號」砲艇叛變的主因是管教問題，其次是該艇奉命開往臺灣，但因大部分艇員有家眷在大陸而不願意從命。⁴⁰不過在國軍資料中卻只略稱「因汕頭巡防處指揮不當而陷共」。⁴¹

11月29日與30日發生的「江防艦隊」與「郝穴」、「永安」等艦在四川的叛變，其實是先後發生的同一件事。⁴²江防艦隊司令葉裕和是廣東華僑，艦隊中軍官有三分之二為閩籍，士兵更高達90%，可算是一次「典型」的閩系投共事件。不過當時艦隊被困在長江上游的四川，下游一直到出海口早已全部為共軍占領，插翅難飛，與其說叛變不如說是投降。

³⁹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起義投誠·海軍》，頁153-160。

⁴⁰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起義投誠·海軍》，頁177-178。

⁴¹ 張力等撰，《海軍艦隊發展史（一）》，頁636。

⁴² 張力等撰，《海軍艦隊發展史（一）》，頁3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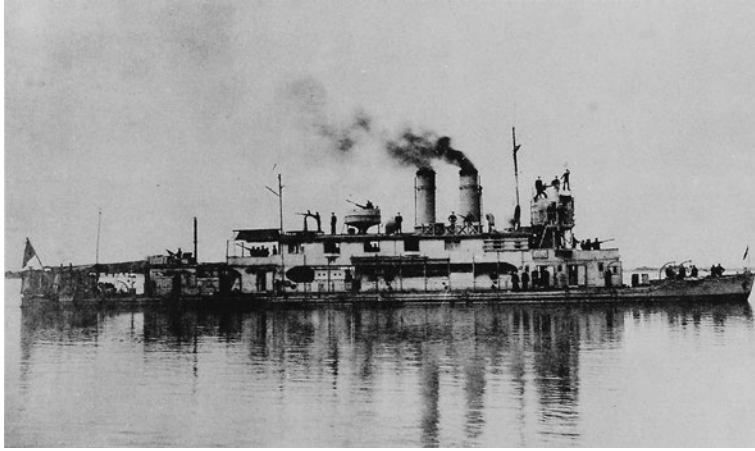


圖8、投共之「郝穴艦」

說明：「郝穴艦」原名「永濟艦」，1948年因在湖北郝穴鎮的戰功而改名。

圖片來源：姚開陽，《1949大叛艦》，頁206。

11月4日發生的「同心號」運輸艦叛變原因也類似，因為無處可去，只有投共。「同心號」艦長江淦三中校（葫蘆島海校航海3期），籍貫江蘇宜興，東北海軍出身，與閩系亦無關聯。⁴³

肆、叛變事件「閩系」背景的統計與分析

筆者挑選較重要的叛變事件（排除機動艇隊與巡防處，因為太過瑣碎），並列表來評估閩系在1949年歷次叛艦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下：

⁴³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起義投誠·海軍》，頁177-195。

表2、1949年海軍艦艇叛變發動者階級與派系背景一覽表

艦名	發動者	背景
黃安	低階軍士官	東北
掃201	士兵	東北
接19	代艦長	東北
重慶	士官兵	各省
崑崙	艦長	閩系
第二艦隊30艘艦	司令	閩系
永興	低階軍官	閩系
長治	士官兵	閩系
美頌	艦長	電雷
舞鳳	艇長	粵系
聯榮	士兵	東北
光國	士官	他省
江防艦隊7艘艦	司令	閩系
同心	艦長	東北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在這張表中共列了14次叛變事件，「閩系」與「東北系」各占了5次，比例皆為36%。但因各艦排水量及火力不同，所造成的影響力亦不同，不應等同視之。以「重慶艦」來說，它是中國唯一的巡洋艦，噸位最大、價值最高、戰力最強，加上涉及與英國的外交關係，所以影響最大；其次是「海防第二艦隊」，因為涉及的艦艇數量與人員極多，影響也很重大；第三是「長治艦」，也是戰力極強的軍艦。但「重慶艦」叛變並無閩系色彩，「海防第二艦隊」司令林遵雖為閩系，但在事件中未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參與投共的艦長也不見得都是閩系；而且海軍派系矛盾主要存在於高級軍官之間，若由低階軍士發動的叛變，則與派系關聯不大，譬如「長治艦」。因此將1949年海軍叛變之主因歸咎於「派系矛盾」，恐未盡周延。

為便於釐清「派系因素」在叛艦事件中的實際影響性，筆者將歷次叛艦事件的原因歸納為「主要原因」、「次要原因」以及「備註」（標明由派系因素不明顯的低階官兵發動）進行資料檢證和討論。

表3、「派系因素」在1949年中華民國海軍艦艇叛變事件的影響力

艦名	主要原因	次要原因	附註
黃安	管教/個人利益	派系（東北系）	低階
掃201	管教	派系（東北系）	低階
接19	地下黨	派系（東北系）	
重慶	對時局不滿	地下黨	低階
崑崙	個人利益	派系（閩系）	
第二艦隊	被包圍	派系（閩系）	
永興	地下黨	派系（閩系）	低階
長治	管教/個人利益	派系（閩系）	低階
美頌	對時局不滿	不想赴臺	
舞鳳	對時局不滿	派系（粵系）	
聯榮	地下黨	管教/個人利益	低階
光國	管教	不想赴臺	
江防艦隊	被包圍	派系（閩系）	
同心	被包圍	無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伍、叛變事件發生的基層與人性因素

海軍艦艇叛變比起陸軍部隊難度要高出甚多，一方面由於艦上空間局促，人與人距離非常靠近，謀叛人員要保持機密十分困難；其次海軍為專業軍種，各司其職，局部人員叛變很難將船開動，如果艦長不配合，更不可能安全航行到目的地。因此1949年海軍發生如此多起的叛變，甚至還有整個艦隊數十艘艦艇一起投

共的情況，實為難以想像之事。因此，探討當時海軍叛艦事件，除高層派系矛盾因素外，尚需從實際運作和人性的角度來思考。

以現在的標準看過去的海軍，往往因難以理解當時的環境而產生錯誤的見解。在過去無論那一派系，艦上的一切都是模仿英國海軍，而依英國海軍傳統，在海上執行臨檢獲物資是可以分成的，所有水手都要排成一長列，從艦長手裡領取其份額，但查扣的物資並不一定是違禁品，有些可能是槍砲威脅下的恐嚇取財，這就是當時共軍宣傳國軍軍艦搶劫民船的由來，這對較有正義感的年輕水兵，可能就難以忍受。而分配時若官員獨吞大部分，還會引起基層的不滿，有些拒絕領取不義之財的水兵又會被長官或同儕排擠，這些都成為艦上的不安定因素。

其次，早年英國海軍艦上並不一定是軍人，約有三分之一是在當地聘僱一般民眾從事鑪煤、炊事、理髮、木匠、修鞋、文書、僕役等非戰鬥性勤務以節省成本。根據此一傳統，早年中國海軍之艦長，可以隨意任用自己的家人親友上艦工作，薪餉來自包幹的公費。在這種歷史背景之下，1949年的中華民國海軍艦艇，都有官兵的家人在艦艇上工作，使得中共地下黨有可趁之機；據統計自1949年2月至12月，海軍艦艇官兵叛變投共事件計有21起，其中受到中共直接策動的有15起。⁴⁴

中共地下黨的策動也是因素之一，包括由中共膠東軍區東海軍分區在青島策反的「黃安」等三艦；由中共「上海局」陳健藩運動其同學沈勛策反其父「崑崙艦」艦長沈彝懋，此外，他也策反了「長治艦」的陳仁珊。⁴⁵較特別的是化名陳志遠的何友恪（1921-，馬尾9期），他在「重慶號」接艦回國時擔任鄧兆祥的秘書，「重慶號」叛逃時他已在海總人事單位任職，故未曝光，而且藉由人事調動與串聯之便，接觸了海防第二艦隊的林遵，並利用同學郭成森策反其學生「永興艦」的陳萬邦，又策反「靈甫艦」的官兵離開香港北上投共，最後還透過同學李

⁴⁴ 金智，〈綏靖戡亂時期中國海軍的建軍發展〉，《軍事史評論》，第23期（2016年6月），頁138-139。

⁴⁵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起義投誠·海軍》，頁88-195。

作健，策反「聯榮艦」，前後參與次數多達五次。⁴⁶

1949年中華民國海軍艦艇的叛變，由閩系主導或參與的相關案件，其次數並不如想像之多，能成功的更少，行動力還不如北方人的低階士官兵；真可謂「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就像海軍耆老李連墀將軍（1911-2008，青島3期）對閩系軍官與山東水兵的評論：

馬尾海軍教出來的學生，真的規規矩矩，有板有眼，國際禮節做的比別人都週到，船上清潔也都比別人乾淨，儀容都夠，但沒有軍人精神，因為他們本質膽小，沒有勇氣打仗，怕死，這是他們的嚴重缺點。……南方人就是文弱，北方人就是強悍，這是事實。山東大兵是了不起，真是好傢伙，若找班長，山東班長就是好嘛，又忠實又可靠，體格又強，真的不馬虎。因為一方人有一方人的個性。⁴⁷

在許多軍艦叛變的案例中都攜帶有家人在船上，像「黃安艦」的叛變者艦務官鞠慶珍與同夥的王子良、劉彥純、張杰、劉振東、毛鶴等人就攜帶了妻子、未婚妻與表兄等共 6 人，「崑崙艦」艦長沈彝懋攜帶妻子、兩個兒子與媳婦，「美頌艦」艦長毛卻非攜帶妻子、兒女與弟弟，「光國艇」艇長袁福厚攜帶妻子與子女，袁福厚甚至是當著妻兒的面被叛變者綑綁投入海中射殺的。以現代標準來看，軍艦調動攜帶家眷上艦是嚴重的軍紀問題，但在當時卻是司空見慣，雖說部分是奉命攜眷撤臺，但有些叛變卻正是因為讓那些具有中共地下黨員身分的眷屬上艦而造成的。

叛變事件中有四次是失敗的：「接十九」、「崑崙」、「永興」、「美頌」，涉及的派系：閩系2次、東北系1次、電雷系1次。除「永興艦」是叛變者當場死亡外，其餘三次都是綁赴刑場槍決。⁴⁸

⁴⁶ 王俊彥，《陳志遠傳奇》（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頁48-49、143-145、209-211、272-274。

⁴⁷ 張力、吳守成、曾金蘭訪問，張力、曾金蘭記錄，〈李連墀先生訪問紀錄〉，《海軍人物訪問紀錄》，第1輯，頁58。

⁴⁸ 馮曉蔚，〈國民黨軍艦艇四宗起義失敗原因〉，《文史春秋》，2014年第2期（2014年5月），頁20-26。

海軍艦艇叛變事件集中於1949年，之後就完全沒有了，原因之一是1950年後兩岸隔海分治，距離的因素造成叛逃難度增加；其次是蔣經國的政工系統開始上艦監軍；第三個原因是當美軍協防開始後，所有軍艦行動都要向美方通報，在美軍高科技的監視下，艦艇動向無所遁形，加上第七艦隊的攔阻，讓叛逃行動難以進行。

毋庸諱言，桂永清主導的海軍人事和殘酷鎮壓，讓當時閩系背景的官兵受到整肅，也的確有許多閩系大老在1949年後留滯大陸。但蔣介石來到臺灣之後並未因此消滅「閩系」，反而讓梁序昭（1903-1978，福建閩侯，煙台海校17期）在臺海熱戰的1954年連升三級，接替馬紀壯（1912-1998，河北南宮，青島3期）擔任海軍總司令，而非大家都以為必然扶正的「天子門生」副總司令黎玉璽（1912-2003，四川達縣，電雷1期）。

黎在梁序昭之後接任海軍總司令，黎之後是劉廣凱（1914-1991，遼寧海城，青島3期），劉因「八六海戰」⁴⁹意外下台，接任的是粵系的馮啟聰（1914-1994，廣東番禺，黃埔海校19期），如此四個派系輪流，當戰後新制中央海校的畢業生上來之後，海軍派系問題才隨著時間逐漸消弭。不過新制中央海校學生部分係抗戰期間在貴州桐梓的馬尾海校入學，這批後來以36-38年班畢業的學生曾因閩系標籤受到桂永清的迫害，譬如曾任海軍總司令與參謀總長的劉和謙（1926-，安徽合肥，馬尾11期、36年班）。

陸、結論

1949年海軍叛變的背景，一方面是抗戰勝利後大環境的惡化，社會並沒有隨著戰爭的結束而恢復正常，反而國共雙方的武裝鬥爭更形激烈，其規模甚至超越

⁴⁹ 「八六海戰」發生於1965年8月6日，中華民國海軍為執行「海嘯一號」特種作戰任務，意圖以海上軍力掩護輸送兵力，搭載陸軍總司令部特種軍事情報隊的M-2型膠舟1艘，載特戰工作人員7人，以東山島為目標，實施兩棲偵察及海上突擊襲擾，並相機摧毀共軍沿岸雷達站，又稱「東山海戰」。劉廣凱，《劉廣凱將軍報國憶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頁262-269。

對日抗戰，讓人民心生疲倦，普遍反對內戰。其次是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工作弊病叢生，官員貪污腐化的印象深植人心。因內戰之故，政府財政負擔加重，影響生產事業恢復，造成通貨膨脹與經濟崩潰，尤其金圓券事件讓軍公教人員受傷最深。加上中共宣傳與地下黨的挑撥，人心迅速失去。在海軍內部則是人謀不臧，特別是主事者的心態與領導問題，黨同伐異下內部出現互不信任的情況。

《新聞天地》雜誌在1949年7月第75期曾刊登由耿中新撰寫的〈海軍需要爭取人和〉文章，切中桂永清的治軍所造成的問題：

中共不可能亦不必要建立海軍，但是他們要利用一切手段來瓦解政府的海軍，而增加其人事糾紛，粉碎其作戰意志，是最短最順利的捷徑。⁵⁰

海軍是高度專業的技術軍種，經驗傳承非常重要，傳統海軍大國的歷史都超過百年，中共海軍成立至今70年，能有現在的成就可謂相當不容易，這當中投共閩系提供的幫助無疑是相當巨大的；叛艦事件表面上損失的是艦艇，但損失更大的是人才。以「重慶艦」為例，近600名艦員的編制，當時的海軍尚且湊不滿，還要徵集大學生參軍並送到英國受訓兩年，這些在當時都是鳳毛麟角的頂尖人才，因「重慶艦」叛變一下子損失這麼多人，怎不令當局痛心疾首？

綜上研究，1949年海軍艦艇叛變與「派系矛盾」不能說完全無關，但並非主要因素。更多的是與基層士官兵的矛盾，甚至閩系軍官的腐化，有時成為反動的一方，被基層士兵關押裹脅投共。

在兩岸政治現實下，雙方對於這段歷史的解讀必然差異甚大。對大陸方面來說，國軍起義本身就具有高度的政治意涵，因此必須以偉大的情操來解釋當事人的動機，這些人也不得不依循這個腳本演出，即使如此，在往後的歷次運動中仍會被以「假起義」罪名揪出來批鬥。對國軍而言，這段歷史並不光彩，長期以來成為禁忌與不願碰觸的話題。

⁵⁰ 轉引自陸寶千訪問，官曼麗記錄，《鄭天杰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頁116-117。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重慶黃安兩艦叛逃案〉。
〈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手令彙編〉。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海軍艦艇叛變案〉。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武裝叛國（一七六）〉。
《蔣經國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蔣經國與各界往來函札（三）〉。

二、專書

-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起義投誠·海軍》。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
- 毛扶正等作，周佩蓉、陳銘城、曹欽榮編輯，《看到陽光的時候：臺灣白色恐怖受難文集》，第2輯。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2014年。
- 王玉麒，《海癡：細說余振興與老海軍（1889-1962）》。臺北：河中文化，2011年。
- 王俊彥，《陳志遠傳奇》。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
- 金智，《青天白日旗下民國海軍的波濤起伏》。臺北：獨立作家，2015年。
- 姚開陽，《1949大叛艦》。臺北：蒼壁出版社，2017年。
- 馬逸夫，《國府海軍艦艇在大陸時叛變補充資料》，手稿，2000年。
- 張力、吳守成、曾金蘭訪問，張力、曾金蘭記錄，《海軍人物訪問紀錄》，第1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
- 張力等撰，《海軍艦隊發展史（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年。
- 張潤書，《行政學》。臺北：三民書局，2009年修訂四版。
- 陸寶千訪問，官曼麗記錄，《鄭天杰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劉廣凱，《劉廣凱將軍報國憶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蘇小東編著，《中華民國海軍史事日記（1912.1-1949.9）》。北京：九洲圖書出版社，1999年。

三、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金智，〈綏靖戡亂時期中國海軍的建軍發展〉，《軍事史評論》，第23期（2016年6月）。

張力，〈1940年代英美海軍援華之再探〉，收入李金強、麥勁生、劉義章編，《中國近代海防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1999年。

張力，〈航向中央—閩系海軍的發展與蛻變〉，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五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2000年。

張力，〈陳紹寬與民國海軍〉，收入《史學的傳承》編輯小組編，《史學的傳承：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

陳謙平，〈論“紫石英”號事件〉，《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

馮曉蔚，〈國民黨軍艦艇四宗起義失敗原因〉，《文史春秋》，2014年第2期（2014年5月）。